

• 走向新世纪丛书 •

新旧政学系

孙彩霞 著

华夏文化出版社

总序

阿 弘

天下有三不朽，“立言”其一，然须“言得其理，理足可传”，所以扬雄把抒情的诗词歌赋，看成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思之气短。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主文以载道，鄙视专在词藻方面用功的骈骊俳偶，认为缺乏“经诰指归，马班气格”，相信也基于同样的观点。古人师意不师辞的想法，显然在乎突出内容而贬低技巧，拘泥形式而忽略艺术旨趣，难免失之偏激，跟现代人的见解大相径庭。

其实，现代人写作的精神，虽然未必满篇大道理，但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同样表现了时代的特色与气息，透露了对整个人生的看法，将当代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传之后世，达到如出一辙的立言效果，因此，现代文学纵然与经国大业有了距离，从直接易为间接，但其为不配之盛事，则始终如一。

《走向新世纪文丛》的编审与出版，就是认定任何一种文艺体裁，无非重要的历史文献，一切的文学形式，均具肯定的文化价值。职是之故，作家既然在当代扮演了他们难能可贵的角色，在文化的推展方面贡献了他们的才智与力量，那么，向历史交待的任务，我们也就毫不犹豫地肩负起来，给予适当的配合和具体的支持，庶几不致交上白卷。

我们深信，只要大家努力耕耘，既使硗确的土地，总有一天也会繁花似锦。

前　　言

政学系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和社会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政学系又分旧政学系和新政学系，旧政学系始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止于一九二三年；新政学系活跃于一九二八年四月，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结束。

政治派系不同于政党，不象政党那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也不够严密，在政治斗争中缺乏像政党那样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作为一个政治派系，政学系是怎样在旧中国这块政治土壤中产生的呢？一九一六年国会重开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稳健派因在副总统选举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故另行组织“政学会”，时人称之为政学系。政学会成立后，一方面反对段祺瑞的集权专制，另一方面因其成员身为段阁阁员，所以极力拥护段的对德宣战方针。张勋复辟时，政学系成员竭力劝说总统黎元洪反对“引狼入室”。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政学系积极响应孙的号召，纷纷南下，召开非常会议，助成建立护法军政府。期间，政学系因与西南军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很快和西南军阀特别是桂系陆荣廷勾结在一起，始而推动成立西南联合会议，始而筹划改组军政府，最终推翻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制军政府，建立了以本派领袖岑春（左火右宣）为首的总裁制军政府，和西南军阀一起篡夺了护法领导权。至一九二零年，孙中山令陈炯明回粤驱逐桂系，总裁制军政府宣布解散，政学系亦随之鸟兽散。一九二二年，直系军阀打败皖系，拉黎元洪出来复职，恢复旧国会，实际上为曹锟“黄袍加身”过渡。在黎、直斗争中，政学系的一些成员是总统的幕后亲信，并在内阁中占有席位，始终拥黎

反直。曹锟迫黎下台，贿选总统，政学系坚决反对但告失败，其成员星流云散，自谋出路。从此，旧政学系作为一个组织活动基本结束，退出历史舞台。

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一批旧政学系成员改换门庭投入蒋介石的麾下，跻身于蒋亲信幕僚之列，并与一些国民党官僚、政客、学者等结成联盟，互相援引，逐渐形成一个派系，时人称为新政学系。新政学系虽无组织无纲领，但人们肯定杨永泰、张群、熊式辉是这个派系首脑，并认为凡和杨、张、熊接近的，即为新政学系分子，如黄郛、吴鼎昌、王世杰、陈仪、沈鸿烈、张家、翁文灏、何廉等。这些人个个权势显赫，在蒋介石身边呼风唤雨，左右政局。并始终拥蒋、亲蒋、忠于蒋，为蒋的统治出谋划策，因而受到蒋的特殊信任和重用，以致于某个时期，在蒋的心目中的政治地位远远超过了CC系等其它派系。

一个政治派系之所以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是它处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的政治生态中，旧政学系活动的历史，正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更替的时代，一方面，一批旧民主主义者继续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新民主主义者为实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而进行斗争；同时，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被军阀群雄代替，各派军阀各霸一方，为权力和地盘的争斗长期展开混战。因此社会上政团林立，政坛上派系复杂，各政团各派系为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纷纷寻求与军阀势力相结合。蒋介石统治权力稳固之后，出于同样原因，一些政治派系纠结在其四周，向权力中心施加影响力。

考察新旧政学系的形成、活动方式及归宿，剖析它的性质及对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海内外尚无研究政学系的专著问世，本书的研究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引起史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

目 录

前言	(1)
旧政学系	(1)
一、政学系的形成	(4)
政团分合出政学会	
政学会成立	
政学会形成的历史渊源	
二、政学系与段内阁	(22)
谷、张入选段内阁	
国会论争中的主张	
讴歌段阁外交方针	
对改组段阁的态度	
反对“引狼入室”	
三、政学系与军政府	(53)
助成护法军政府成立	
推动成立西南联合会	
积极策划改组军政府	
四、政学系与南北议和	(80)
为湘南局部议和穿针引线	
“策励”南北议和	
议和前夕与旧国会的分歧	
与北方主和派私下交易	

五、“北有安福，南有政学”	(104)
破坏制宪	
争夺驻粤滇军	
觊觎广东省长	
对广东的压迫和掠夺	
六、狼狈出粤	(124)
抵制二次改组军政府	
独扛非常国会大旗	
“树倒猢狲散”	
七、图谋东山再起	(140)
反对建立和企图颠覆“正式政府”	
蓄谋图滇	
支持沈鸿英叛乱和欲重返广东政坛	
八、昙花一现	(161)
主张恢复旧国会与拥黎复职	
几经周折小尝中央政权	
干涉司法遭北京学界反对	
竞争参议院议长与重新组合	
挟黎南下与反对曹锟贿选	
新政学系	(193)
一、集结于蒋介石的旗下	(196)
杨永泰投靠蒋介石	
熊式辉叛赖投蒋	
张群寅缘蒋介石	
二、南昌行营时的政学系	(207)
掌握南昌行营政治大权	
为蒋围剿红军出谋划策	

与 CC 等派系明争暗斗	
三、包揽鄂政与杨被刺	(228)
张、杨先后掌鄂政	
杨永泰治鄂措施	
杨永泰遇刺身亡	
四、政学系在金融财政界	(242)
历史的足迹	
支持蒋上台和被控制	
支持抗战和聚敛资财	
政学系资本的“复兴”和结局	
五、参与重庆谈判	(272)
策划国共和谈	
代表国方参加谈判	
六、接收东北	(283)
抢夺接收东北大权	
接收东北失败	
七、接收台湾	(293)
陈仪接收台湾	
陈仪治台措施	
和蒋联手镇压“二二八”起义	
八、为蒋政权挽救危机	(308)
张群任制宪首任行政院长	
发行公债与向美借款	
行宪首任总统与行政院长	
改革币制	
力图建立西南反共基地	
九、笃力社胎死腹中	(336)

旧政学系

旧政学系的历史，起自 1916 年 11 月，止于 1923 年。

1916 年 8 月，国会重开后，当时两个较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为谋求实现本党派的利益和目标，积极筹划，组织议员团体。属于进步党者主要有“宪法案研究会”、“宪法研究同志会”等；属于国民党者有：以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激烈分子组成的“丙辰俱乐部”，以国民党稳健派为主组成的“石附马大街张寓”（即“客庐系”）；此外，还有从进步党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议员及一部分国民党议员组成的“韬园”。9 月，国会召开宪法会议，为促宪法之速成，丙辰俱乐部、客庐系、韬园系结合组成“宪法商榷会”。不久，客庐系因在副总统选举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谷钟秀、张耀曾等人从中分化出来，另于 11 月 19 日在北京顺治门大街江西会馆成立“政学会”，时人称为“政学系”。从此，开始了旧政学系的历史活动。

政学系成立后，在国会关于省制加入宪法、定孔教为国教等问题的论争中，与商榷系意见一致，反对段祺瑞的集权专制。另一方面，因有政学系成员身列段内阁阁员，故极力拥护段的对德方针，但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后，最终否决了参战主张。

张勋复辟失败，重掌中央政权的段祺瑞，不仅拒不恢复旧国会，并且要进而废弃《临时约法》，另行召集新国会。孙中山坚决反对段祺瑞对国会和约法的蹂躏，发起护法运动。政学系和国民党等派议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助成建立护法军政府。但政学系因与西南军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很快与西南军阀，特别是桂系军阀勾结在一起，始而推动成立西南联合会议，始而筹划改组军政府，最终推翻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

制军政府，建立了以本派领袖岑春煊为首的总裁制军政府，和桂系一起篡夺了护法领导权。此后几年中，“南方军政府几成该系之独占舞台”，他们与桂系勾结，在南北议和中，与北方主和派暗通声息，以牺牲国会和约法作为向北京政府私下交易的条件；在国会继续审议宪法时，率其议员全部缺席，破坏制宪；与李烈钧争夺驻粤滇军领导权，致使驻粤滇军分裂；抵制国民党议员二次改组军政府的主张，等等劣行，不一而足，被时人视为南方之安福系。

1920年10月，孙中山命陈炯明回粤驱逐桂系，桂系势力退回广西，总裁制军政府宣布解散，政学系议员独扛之广州非常国会也作鸟兽散。但政学系不甘心退出广东政坛，他们起初反对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正式政府，继而蓄谋颠覆正式政府，接着策划顾品珍回滇驱逐唐继尧，企图在滇扩张势力，又支持桂系沈鸿英叛乱，企图重返岭南政坛。这一切终是黄粱美梦，未能实现！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告终。直系军阀为控制北洋政府的统治权，为曹锟“黄袍加身”过渡，驱逐皖系所扶植的总统徐世昌，拉黎元洪出来复职，恢复旧国会。政学系的一些成员是总统的幕僚亲信，并在内阁中占有两席位置，始终拥黎反直。1923年3月，政学系在北京中铁匠胡同11号重新改组，决定以“守法、卫国、持正、不畏强御”为政治主张，同时决定该组织名称以“宪政社”和“政学会”两名并用。事实上，人们一般仍习惯称为政学系。不久，曹锟急欲登上大总统宝座，用尽手段逼黎元洪下台，政学系乃挟黎南下，企图在上海组织政府，反对曹锟贿选。计划失败后，政学系成员星流云散，各谋出路。从此，政学系作为一个组织，活动基本结束，有一部分政学系成员因出入于河南国民军中，经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从中斡旋，政学系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旗帜下，随之自称为国民党人，不再称为政学系人。自此，旧政学系正式结束，退出历史舞台。

旧政学系的历史，正是我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接合更替的时

代,一方面,一批旧民主主义者继续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新民主主义者为实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而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被军阀群雄所代替,各派军阀各霸一方,为权力和地盘的争夺,长期混战。由此,政团林立,派系复杂。各政团、各派系为谋取私利而攀援军阀势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考察旧政学系这个政治派别的形成、活动及其归宿,剖析它的性质及其活动对民初政治的影响,对研究民国初年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政学系的形成

政团分合出政学会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在北京忧惧而死。当时北方政局的核心人物段祺瑞扶持黎元洪继任总统，并经过几番争议，几番斟酌，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废止袁氏新约法，续行召集国会。于是，南方护国军也于7月14日通电全国，宣布撤销军务院。至此，南北又一次“统一”。

袁世凯死后、国会重行召开之前，喟喟望治的广大人民厌倦政党政治，社会舆论普遍批评政党政治的诟病，错误认为袁世凯的独裁和称帝，是民国元、二年间政党只重党争，不能和衷共济的恶果；认为“今日之中国，决不当再有党争之发生，以贻祸于国家”；“今日之时局，合万众一心以谋建设，忧虑不济，奚可复以党见误国哉？^① 纷纷主张“国本未定以前，似不宜有政党发生，以自破同根之谊，而为凶孽所乘”。^② 在这种舆论导向和广大群众厌倦政党政治、渴望和平建设的心理面前，7月25日，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国内外各地支部，“推翻专制，重造民国”目的已达，各省革命军不仅停止军事行动，“一切党务亦应停止。”^③ 这样，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组建起来的少量革命武装相继解散，该党的党务活动也要取消了。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是舆论界人士，深知舆论的价值，也知道对付舆论的方法，他发表不党宣言，声称“现当国基再造之始，一切建设问题，当合全国优秀人士，以协议一致解决之。若树党相峙，实有百害而无一利”。^④ 汤化龙则要求“各党要人设法将所属之党

① 禹：《时事小言》，《盛京时报》，1916年6月30日。

② 惺公：《议会与政党之回顾》，《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33页。

④ 《梁任公不党之宣言》，《盛京时报》，1916年6月27日。

实行解散”，“从前党帜一律消除。”^① 另一进步党党魁孙洪伊称：他“只知有国，不知其他，一切关于国事之主张，苟利于国者，吾尊之从之，否则吾斥之拒之，即今后建设万端，有商榷争持之处，非分立门户之时。在国基未固以前，凡有已往之党帜及类似政党之团体名意见召者，概不敢闻。”^②

这里，尽管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要解散自己的本部组织，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标榜“从前党帜一律消除”，表面看起来，都是提倡“不党主义”，但其实质却不相同。

孙中山出于对现实的政治形势缺乏深刻的认识，认为只要北京政府宣布恢复约法和国会，中国就会出现一个“真正共和”的局面。在袁世凯毙命的第三天，即6月9日，孙中山就发表了《规复约法宣言》，阐明他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今后奋斗的目标。宣言指出：“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唯一无二之方，无所用其踌躇者。”表示“文志在共和，终始不贰。曩昔以袁氏叛乱，故誓为民国翦灭巨凶。今兹障碍既除，我国人当能同德一心，共趋政治之正轨，文亦将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为献替之刍蕘。若夫曩日宣言，所谓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则今犹是志，亦愿与国人共勉之也。”^③ 随后，在孙中山的命令下，山东、湖北、广东、福建等地中华革命党系统的“中华革命军”、“护国军”先后结束或解散；中华革命党本部及所属机构工作停顿，组织松散。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孙中山在这时的言行，几乎和辛亥革命后让位袁世凯时的情况相同。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孙中山过分相信法律的制约力，相信法律足以约束袁世凯。而当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孙中山又天真

① 《汤化龙宣言不党》，《申报》，1916年7月1日。

② 《孙洪伊主张不党之宣言》，《盛京时报》，1916年6月18日。

③ 《孙文宣言》，《申报》，1916年6月9日。

地认为黎元洪、段祺瑞会遵守约法，执行职务，不再“重蹈天下于纠纷”，决定他自己“不问国事”，只要“与国民党共荷监督之责”，就可以建设富强的完全民国了。孙中山所做的一切，是基于殷切期望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使祖国臻于太平盛世的境地。

与此相反，随着护国战争的结束，进步党和国民党两党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合作也迅速瓦解。进步党人为了防止国民党人的势力抬头，控制即将恢复的国会，一方面迎合社会舆论，标榜“不党主义”，欺骗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另一方面却在积极行动，布置各地进步党人组织起来。例如梁启超在黎元洪电召他到北京“商谈国事”时，7月6日，复电黎元洪说：“觉今后报国之途，与其用所短以劳形于政治，毋宁用所长以献身于教育”，表明他将脱离政治。更在致刘显世等人电中，声称“中止政治生涯，拟办一理想的学校，且精意编译。”^①但7月18日，梁启超在致进步党人熊铁崖等人电中，却明确指出：“吾党今虽取冷静态度，亦不能长此终古”，要组织“无形之党”，^②并要他们积极筹备组党经费。进步党人这时期的言行，与辛亥革命后章大炎为取消同盟会领导权、反对同盟会而抛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何具相似！

然而，随着国会召开的日子日益临近和国会重新开幕，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都不能不调整自己的步伐，抛弃所谓的“不党主义”，为在国会中占据独占优势，积极活动，筹划组织。

就国民党而言，由于政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人开始放弃“不党主义”的主张。黄兴在上海的国会议员谈话会上表示：“凡今日有新思想之同人，俱结合一致，成一真正民党之大团体，以与腐败之官僚相抵抗，盖非是则国基万无巩固之一日也。”^③孙中山此时不但认为：“共和国运用宪法，非有政党万不为功，决不能以散漫之

① 曾业英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71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同上，第731页。

③ 飘萍：《记国会议员谈话会》，《申报》，1916年7月15日。

议员活动之也”^①，并且强调，“凡百事业，须从整理党务入手”。他鉴于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只属于“秘密团体”，影响甚小，筹措规复国民党。后来，他派廖仲恺、胡汉民为代表北上入京，除与黎元洪、段祺瑞商讨国事外，着重扩展党务。

起初，国民党议员由张继负责联络策划，无正式组织名称，因活动地点以张继寓所为中心，故联络机关标名为“张寓”。至9月初，国民党议员已形成三个政团：其一为客庐系，以国民党稳健派为主体，核心人物有张继、谷钟秀、吴景濂等。后来的政学系人物，此时大多属于该团体。其中又以三人为首分为三个小派别。其二为丙辰俱乐部，以中华革命党议员和旧同盟会员为中坚，核心人物有居正、马君武、田桐、白逾桓等，事务所设在北京米市胡同。其三即韬园系，该系由从进步党中分化出来的孙洪伊、丁世峰等组成，中坚分子除孙、丁二人外，尚有汪彭年、郭同、王乃昌等，事务所设在北京安福胡同。

国会恢复后的议员仍然主要由进步党和国民党混合组成。随着国会在副总统人选、议员改选、审议宪法等问题接踵而来，必然出现两军对垒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议员重新组合。9月9日，在孙洪伊的倡议下，客庐、丙辰俱乐部、韬园三系议员，“以交换意见，促宪法之速成为宗旨”，^② 在北海公园举行集会，合组成宪法商榷会，事务所设于北京灰厂转马台。宪法商榷会“所属国会议席达400人，宛然一大政社也。”^③ 但其组织并不严密，内部矛盾很多，意见异常纷歧，不久，便由三系分化成四系。政学会便是其中的一个派系，由谷钟秀、张耀曾等脱离客庐系，于11月19日另外组成。其它三系为：原客庐系的张继、吴景濂、王正廷等，于10月下旬组成益友社；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在1917年2月底合

①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6页。

② 《游北海组织宪法商榷会》，《申报》，1916年9月12日。

③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66页，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6年版。

并组成民友社；王正廷、褚辅成等脱离益友社，于 1917 年 5 月 6 日另组政余俱乐部。

就进步党人而言，国会正式开会后，进步党议员明确表示：“目前虽暂不标举政党名义，然必须有一名目，方足招致同人”，“大都主张速将机关成立，惟党名固不可标举。”^① 8 月 22 日，汤化龙、刘崇佑召集进步党议员 90 余人，在北京安庆会馆开会，决定成立宪法案研究会。与此同时，以王家襄、陈国祥、林长民等为首的进步党人决定组织宪法研究同志会。前者于 8 月 31 日正式成立，发布了《宣言》及《简约》，宣称“以自由精神，按国情、察外势、据学理，以研究宪法案，期成良宪为宗旨。”^② 后者于 9 月 2 日正式成立，通过了《公启》和《简章》，其精神与宪法研究案大体一致，也宣称要“祛党见以集众思”，“研究宪法，举其所得，以供国会参考。”^③ 不久，因国民党议员组成的宪法商榷会在国会中席位占优势，为与之抗衡，两会遂于 9 月 12 日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前煤油矿公司召开合并大会，定名为“宪法研究会”，宣称以“研究宪法及其它重要政务”为宗旨。^④ 宪法研究会在参众两院共拥有议员 200 余人，是国会中的第二大政党。人们将该会简称为“研究系”。

除上述两大派系的议员政团外，还有平社、苏园、宪政讨论会、宪法协议会、静庐、衡社、潜园、宪友会、渊庐、宪政会等 10 个大小不等的政团派系。其中宪政讨论会人数最多，也仅有 70 人；静庐人数最少，只有 10 人，因此活动量很小，在当时的国会角逐中起不了多大作用。

由此观之，袁世凯毙命、国会重行召开之前，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政党在表面上都宣称不党主义，致使国内有派而无党，而各政

① 《议员在先哲祠开谈话会》，《申报》，1916 年 8 月 23 日。

② 《宪法研究会简约》，《晨钟报》，1916 年 9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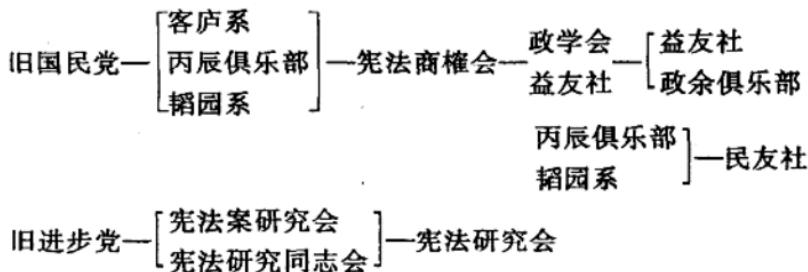
③ 天津《大公报》，1916 年 9 月 3 日。

④ 《宪法研究会简章》，《晨钟报》，1916 年 9 月 15 日。

派组织名目繁多，五光十色。随着国会复开，政局形势的变化，两军对垒的局面已势不可免，而各政团派系的急剧分化和重新组合也势不可免，政学会便是在这种历史事变的进程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团体。

附录：

国民党和进步党议员在国会恢复后各派分合概况：



政学会成立

关于成立政学会的筹备过程，无具体资料可查。仅据 1916 年上海《中华新报》载，10 月初，钮永建、谷钟秀、张耀曾等数十人开会，研究团体结合方法，拟定组织办事处章程，俟大会公决。^① 这大概就是组织政学会的最初决定。11 月 12 日，参众两院议员及段祺瑞内阁阁员张耀曾、谷钟秀等 250 余人在北京顺治门大街江西会馆开发起大会。当日推定筹备员五人：李述膺、文群、邱国翰、徐傅霖、郭椿森；并推定杨永泰、陈鸿钧、吕志伊、张晴、郑际平等人起草会章。^②

关于组织团体的名称问题，也曾发生争论。张耀曾、李根源主张用“政学会”名称，遭到云南国民党参议员孙光庭的反对。孙认为只有学而后从政，未闻政而后学者。他依据《大学》“修身齐家治

① 《团体结合也应研究》，上海《中华新报》，1916 年 10 月 3 日。

② 《两院议员发起学会》，北京《中华新报》，1916 年 11 月 13 日。